

中國大陸改革開放

# 新詞語

李谷城 編



#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詞語

李谷城 編



中文大學出版社

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詞語》

李谷城 編

© 香港中文大學 2006

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。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，不得在任何地區，以任何方式，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。

國際統一書號 (ISBN) : 962-996-258-6

出版：中文大學出版社

香港中文大學 • 香港 新界 沙田

圖文傳真：+852 2603 6692

+852 2603 7355

電子郵件：cup@cuhk.edu.hk

網址：www.chineseupress.com

*A Glossary of New Political Terms of the People's  
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-Reform Era* (in Chinese)

Compiled by Li Kwok-sing

©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2006

All Rights Reserved.

ISBN: 962-996-258-6

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

Sha Tin, N.T., Hong Kong.

Fax: +852 2603 6692

+852 2603 7355

E-mail: cup@cuhk.edu.hk

Web-site: www.chineseupress.com

Printed in Hong Kong

## 翁 序

讀書學習、研究著作、論道演說，手頭有一部切題而可靠的工具書，事半而功倍。這對中國學，再真不過。筆者鑽研教學中國政法四十年有多，深深體會，掌握專有詞匯乃屬此門基本工夫之道理。

說到中國學，在中國改革開放前，無疑是學術界的一種旁門左道。共產黨掌政的國家，凡事保密。當年，國際間的中國專家總覺得“竹幕”後面諱莫如深，常不得不玩些猜謎遊戲。他們多從事所謂“北京學”（Pekinlogy），在北京官方的領導人物排名順序上吹毛求疵，對黨內高層的派系鬥爭捕風捉影，略有見解就長篇大論。

中共治國，在毛澤東時期（1949 – 1976），動不動就搞政治運動，既整肅異己，又愚弄衆人。毛澤東似乎樂此不疲，或因進可帶動革命，退亦可保固政權。無論如何，一搞運動就有口號，所謂口號，當然是某些政策、主張的濃縮精簡，遲早變成特有名目，譬如“三反五反”、“抗美援朝”等。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，言出一黨，領導訓示，政令下達，都得化約成順口搶眼的詞句，以便傳達引用，正如“工業學大慶、農業學大寨”、“工作方法十六條”等。這些應是官方生產的政治用詞主要的來源。

針對這類政治詞語，本書編著者香港珠海學院的李谷城（國成）先生曾經出過《中國大陸政治術語》一冊，收錄詞語五百多條，詮釋詳實，一九九二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印行，甚受歡迎。在講解中國政法的課程中或在研究相關課題時，筆者經常翻用該書，頗覺得心應手，因而也常向學友同好推薦。數年後，該書並由 Mary Lok 女士英譯，另行出英文版，英文世界的當代中國

專家頗多查用。

毛澤東辭世後，中國政權由鄧小平掌舵，進行改革開放，短短二十餘年間，大地重新變色，已呈回春迹象。所謂“北京學”已逐漸為比較正規的“中國學”(China Studies)所取代。中國學資料比較正確，方法也要細緻科學許多，內容當然比北京學全面而豐富，不但不再獨重政治，倒有“經濟掛帥”的勢頭。隨着改革開放的推動發展，中國的社會、文化、思想、理論都跟着變化，法律、道德、教育、科技、軍事、外交等其他領域無不轉變面貌。不言而喻地，許多新時期的新詞語也應運而生。谷城先生又及時編寫了這本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詞語》，實在可喜可佩。

《中國大陸政治術語》涵蓋的是一九四九至一九九〇，大約四十年間的重要事物，共五百多條。本書搜集了一九七八至二〇〇五，大約二十八年間的常用新詞語，時間短近半，條目卻增加一倍，有一二九五條。實際上還不只加倍，因為前書中有許多條目也屬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。這情況應不只是谷城先生主觀多選，而是自然反映了改革開放時期比較多元、全面的新變化、新發展。

開放時期新詞語，除了官方的政策、政令（謝天謝地，政治運動已成歷史記憶）之外，增加不少社會上非官方人士對各種政治、社會現象的歸納創發和一些國外引進的外語、外來詞。官方的政策、政令以及領導人的講話肯定比毛澤東時期“實事求是”。“假、大、空”還是很多，“光榮、偉大、正確”仍舊當道，但是“三個代表”、“建設小康社會”比起“三面紅旗”、“全國山河一片紅”，就不那麼刺耳了。“四碗飯”、“五陪風”、“有償新聞”、“出口轉內銷”，顯然是改革帶來的一些病態；但是“希望工程”、“依法治國”若能落實，則值得吾人鼓掌讚揚。

非官方的詞語用得多些，便是相對開明的表現。民間的發明或歸納，有很多是挖苦官僚幹部的，如“六敢官”、“五十九歲

現象”、“四工幹部”、“三手代表”、“二首長”、“一〇一部隊”等等。這些都表達人民的不滿和無奈，和民間流行的順口溜有異曲同工之妙。間中也有一些是積極性的訴求和希望，如“五官端正幹部”、“江陰現象”、“扶貧狀元”等。

至於外來詞，大多數是新近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引進的，和早年“一邊倒”時期，大量從蘇聯、東歐引進的馬列用詞，真不可同日而語。語言和文化本屬一體，引進用詞，無異於引進文化。電腦用語和電腦科技以及相連的資訊時代信息文化是一整套的。中共當局要資訊時代的快速、準確又開放的信息，卻不讓網民自由採擷、自由溝通，還經常封網，乃至逮捕網上異議人士，公然以言入罪，實在可悲。事實上，改革開放以來，進步的中國人已普遍地在“洋消費”——“打的”、用“手機”，追求“洋時尚”——考“托福”、唱“KTV”。北京當局在國際上反對“一超”獨霸，主張“多極世界”，在內政上則始終堅持一黨專政，不放棄“一言堂”方針，不知這種“魚與熊掌”我都要的算盤還能打多久。總有一天，專制政權將無法有效封鎖新聞而被迫放棄專制，或者垮臺。無論如何，外來語的引進，對一個長久自閉的國家社會是好事、是要務。這一方面，中國還是嫌慢嫌少。日本早就有洋洋大觀的《外來語辭典》，年年翻新，中國想崛起，怎可不努力迎頭趕上。

外來文化語言也好，內部的改革開放也好，二十餘年來，中國大地的確變化可觀，只可惜政治發展仍是蝸牛慢步。就積極而言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中國政治權威已經世俗化，不復高高神聖；社會已有國家政府以外的些許活動和發展空間，不再鬥爭不已；激進革命思想已為漸進的改革潮流所取代，比較正常理性；意識形態也為法律讓出少許地位，衆人之事多少有法可依。這些，是可喜的現象。這些變化，已為大陸經濟社會帶來活力，為大陸，特別是沿海地區人民提高了生活水平。但是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，消極面仍較突出。一黨專政如故，黨政各有分工，卻未分開，“多黨合作”只是幌子；“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

制”依然拒絕分權制衡，而官僚腐敗，不堪言狀；所謂“民主集中制”實是集權的藉口，“差額選舉”僅是聊勝於無；“民權保障、言論自由”皆有名無實，為人詬病。

說透了，這本《改革開放新詞語》正正反映中國在變遷轉化中的，半開放、半封閉的體制和現象。鄧小平“摸着石頭過河”，苦口婆心地解釋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”，煞有其事地推行“有中國特色的”這個、那個；江澤民說“八個堅持、八個反對”；朱鎔基提“一個確保、三個到位、五項改革”；胡、溫要抓“三農問題”，主張“新三民主義”；如此這般，在在顯示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，實在是工程艱巨，代價高昂。

若說代價，除了人民尚要“和中央保持一致”，在基本人權（特別是言論和新聞自由）被剝奪的情況下，為一個專制政權歌功頌德之外，還得注意環境破壞對未來年代的透支，下崗工人和廣大鄉村農民在政策歧視下的廉價汗勞和貧困的痛苦。北京當局對法輪功成員和天主教神父無端迫害，因“嚴打”而執行佔全世界最高位數的死刑，以“國情”為名濫捕學者、記者和民運人士等，類似行徑所造成的惡名也是中國人共同承擔的代價。

不過，所謂“中國崩潰論”不無根據，卻言之過早。銀行壞賬持續居高，高達GDP的百分之三、四十，駭人聽聞，但其中實有很大量的“國企改革”時的變通“政治貸款”。國庫每年因“官倒”、“公款旅遊”（包括賭博）、捲款攜金外逃而流失人民幣以百億計，這也是一個共產政權國家向資本主義過渡，法治不彰時，官僚玩弄“國家資本”的過程中很難避免的現象。城鄉差大、貧富懸殊是“一部份人先富起來”的政策帶來的苦果。社會治安敗壞，道德淪喪則與共產主義、馬、列、毛意識形態破產，新的行為規範尚未生根關係密切。這些問題都十分嚴重，但是，北京當局並非無動於衷，而是在努力設法處理。許是權大，又拜經濟高成長率和大量外來投資之賜，中共似乎至今總能渡過難關而“軟着陸”。

所謂“中國威脅論”，在臺灣評說的人不算多，在日本、印

度、東南亞等國有較大市場，在美國也不少附和者。臺灣少用，大概因為中共對臺威脅一直存在，沒有提出此論之必要。此論肯定與中國近年之崛起有關，北京故意強調是“和平崛起”，多少不免引發“此地無銀”的聯想。中國地大人多，經濟起飛後，能源物資的消耗自然對全人類的“可持續發展”不無威脅。前不久的“通縮出口”總不免對他國的第二產業及就業情況構成巨大威脅陰影。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後，軍事國防要配合“大國外交”而擴張加強，這就不只威脅鄰國，還挑戰超強美國，那將是高層次的、中長期的、世界性的威脅。如果中國共產黨政權不幸崩潰，國界失去防制，可以想像，中國難民對世界各國又將會有什麼樣的威脅。寫到這裏，不禁要說，對中國開導，使她成為一個負責任、講法律的國際成員，仍是比單純對她圍堵可取。只是，開導是否能成，英美、歐盟、日本、印度都難有把握，因之，也不得不有圍堵遏制的設想和準備。

說到對臺灣威脅，筆者注意到這兩本詞語工具書中，關於臺灣兩岸事務的條目不算多。《政治術語》中有“一中一臺”、“一國兩制”、“三通”、“九條方針”（“葉九條”）、“三通四流”、“臺獨”、“告臺灣同胞書”、“兩個中國”、“鄧六條”、“獨臺”等十條。《改革開放新詞語》中更少，只得“一邊一國”、“小三通”、“中美三個聯合公報”、“文化臺獨”、“江八點”、“兩個中國”、“葉九條”、“漸進式臺獨”、“鄧六條”等九條。其中三條重複，所以總共不過十六條。這不知是否意味，臺灣問題在中共現實的算計中並非優先項目？大致上，若說新用詞多的是經、貿面的，行政管理和法律詞句相對也不少，政治面少了，應非過言。至於兩岸之事，相比之下，不算要務。

從上面的一些個人淺見的討論，讀者不難看到《中國大陸政治術語》和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詞語》是兩本十分好用的工具書。要認識、談論中國大陸之事物，不掌握相關詞匯是不行的。讀者可能也注意到，筆者引用的詞語有些取自前書，有些取自後

書，也有幾個是不見於二書的，如“和平崛起”、“大國外交”；如“政治貸款”、“出口轉內銷”；還有“新三民主義”、“反分裂國家法”等。

筆者冒昧要給讀者和編著者各提一項建議。讀者涉獵今日中國學，恐怕要兼備谷城先生這兩本詞書，兩本一起，隨時翻查，否則不易得心應手。但是，這兩本也還有不足之處，所以要請編著者着手進行第三冊的工作。這不只是說谷城先生搜羅選擇有遺珠，更是因為中國本身繼續改革開放，應會抵達另一新境界。中國要實現“四個現代化”，前途仍多崎嶇，但我們希望她會發展成一個真正民主法治、愛好和平正義的國家。如果第三冊能定名為《民主中國的新詞匯》，該有多好！

谷城先生是資深的文字工作者，多年來在媒體上、在學術界默默耕耘，著作等身。他是看實際資料分析判斷，不斷提供可用資訊和熟思見解的一位學者，雖不在理論方法上空談作態，卻有獨特過人的貢獻。編纂詞書多是數人乃至數十人長期辛勞的工作，谷城先生單槍匹馬，孜孜不倦，書成而各界讚許，誠然難能可貴。

能者多勞。谷城先生雖然是中國大陸專門詞語編寫能手。他偏勞，我們就獲益良多了。

翁松燃

二〇〇五年六月七日埔里暨大

# 前言

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，鄧小平重新掌權。他和胡耀邦、趙紫陽等改革派主要成員，首先結束「文革」之亂，「撥亂反正」，「平反冤假錯案」；繼而推行「改革開放」政策。中國大陸由上而下，從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思想意識，到社會風俗等方面，開始發生劃時代的變化。與此同時，新詞語不斷湧現，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新面貌。

改革開放政策實行28年來，無論是黨政機關的文件，領導人的講話，或是各種大眾傳播媒體之中，以及在社會各階層的口語裡，都出現各種各樣的新詞語。把這些詞語篩選整理成書，對於了解這個時代的內涵，可以起到目舉網張的功效。

## 一、中共建國以來詞語的源流與演變

中共建黨時期，有不少人到蘇聯留學或受訓（如王明、博古、劉少奇、鄧小平、李富春等）。他們從俄文、德文等歐洲語文翻譯引入一些外來語，多數是宣傳馬列主義的政治術語。但是，這些詞語流傳下來並不多，也許是不同文字體系，但絕大部分已被強勢漢語「漢化」的緣故吧！延安時期中共幹部讀的馬列主義書籍，多數是由日文轉譯或照搬來的。

20世紀50年代建政初期，中共派出大批學生留蘇，包括江澤民、李鵬、鄒家華等人。當時，內地高等院校以俄文為第一外語，英語反而很少人學。在20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漢語中的外來詞語，大多來自俄語，對其他語文的引進，特別是來自西方的語文，基本上是排斥的。這正好說明，當時視蘇聯為「老大哥」的「一邊倒」現象。這個時期有不少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，他們也

從俄文帶來不少政治、經濟、科技詞語。但是，這些詞語流傳下來的並不多，原因與上述差不多。20世紀60年代中期，中蘇大論戰之後，蘇聯在中國的影響迅速消失，俄文也逐漸被人遺忘了。

在1966－197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，政治術語滿天飛。然而，都是一些早已出現過的馬列主義詞語，諸如「階級鬥爭」、「無產階級專政」等；或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，從中國古書中活學活用而得來的術語，諸如「黨八股」、「牛鬼蛇神」等<sup>①</sup>。此階段的中國大陸，實際上又一次進入「閉關自守」的境界。

直至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，才開始由港澳台，再次大量引進新的詞語。28年來，漢語辭彙量急劇擴充，新詞語不斷湧現。這一階段雖然不像「五四運動」那樣發生一場語言革命；但是，至少是中國語言文化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變革。

## 二、改革開放新詞語的主要特徵

「十年文革」時期的新詞語，充滿了「階級鬥爭」、「無產階級專政」、「繼續革命」的血腥味；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新詞語，以經濟體制改革、社會民生的變化為主，文革時期盛極一時的政治術語，迅速式微，這是改革開放新詞語的第一個明顯的特徵。

及時地將一個時代的新詞語整理匯編，可以幫助人們更加容易了解這個時代的內涵；而且，可以將一個時代的真實紀錄，留在史冊上。這是編撰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。

單詞，是語言文字的最基本元素，它是記載了人類思維的最基本單元。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，詞匯呈現由單音節向雙音節、三音節、四音節，甚至多音節發展的趨勢，以表達人類越來越複雜的思想，反映越來越複雜的社會現象，滿足社會越來越廣泛的交際需要。語言學家王力認為：

中國本來是有複音詞的，近代更多，但是不像現代歐化文章裡的複音詞那樣多。打個很粗的比例，古代近代和現代

的複音詞數目大約是一、三和九之比。<sup>②</sup>

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，來說明改革開放新詞語的音節變化。譬如，「代」與「表」都是單音節；「三個代表」是四個音節；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」是十三個音節。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詞語，音節越來越多，表達的念意越來越複雜，這是改革開放新詞語的第二大特徵。

改革開放新詞語的第三個特徵是，產生大量的簡縮詞語。譬如，「一個中心、兩個基本點」、「三來一補」、「五講四美三熱愛」等，它們所要表達的已遠不止是一個詞或語的含意，而可能是一個長句，甚至是一篇短文章的濃縮含意。

中共宣傳部門，經常使用大量深奧的長句子，撰寫官方文件。然而，這些「又長又臭」的「黨八股」（毛澤東語），又必須轉化為容易宣傳及記憶的簡縮詞語，以便向人口衆多但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人民傳達，和開展思想教育，這是造成中共執政下簡縮詞語越來越多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改革開放新詞語的第四個特徵是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外來詞語。首先是英語，日語退而居其次；而且，對外來詞語的「漢化」能力越來越弱，漢語的強勢地位，受到英語的嚴峻挑戰。

外來語，又稱「外來詞」（Alien Word），或「借詞」（Loaned Words），它是從外民族語言中借用過來的含有音譯成分的詞語。據語言專家的統計，僅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前10年（1978 - 1988）引進的外來詞語，就比1949 - 1978年的30年間，多出4倍！而且，許多外來詞語是原封不動地「引進」。<sup>③</sup>

雖然，外來詞語激增是近代以來世界上各種語言的普遍趨勢，不過，過去漢語吸收外來詞的傳統方式絕大多數是民族化，即漢化意譯，而且，漢化量很大，漢化相當徹底，顯示那個時代漢語是強勢語文，它的熔化能力高於其它外語，包括20世紀50年代對俄語的漢化，也相當徹底。<sup>④</sup>

20世紀50年代從俄文中引進的外來語，絕大多數是政治詞語，這類詞語被相當徹底地漢化了，說明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，

有能力吸收、融化馬列主義，也即是將馬列主義中國化。

改革開放後，內地大專院校及學術機構應用外來語越來越多，而且，以英語為主。外資湧入，「洋消費」興起，年輕人以洋為尚，交談之間，常夾帶外來語，也已不足為怪。電子媒體及報刊上，也時有出現外來詞語，而且，常採用中外夾雜的音譯、音意結合，甚至照搬照用，完全「洋化」或「半洋化」，日趨普遍。如熱狗（Hotdog）、巴士（Bus）、的士高（Disco）、CEPE、WTO等。特別是許多科技詞語，以及反映新潮流新事物的詞語，許多都已經「洋化」了。

改革開放以來引進的外來語，範圍廣、含意深，反映了世界潮流的新變化。具有幾千年歷史、擁有幾萬個漢字的漢語，找不到更好的詞語將它「漢化」。此時的漢語，面臨三千年來最大的外來挑戰，在第一強勢語文英語的衝擊下，已經不再是佔絕對優勢的「強勢語文」了。

美國人說：中國正在發生語言革命，從會議室到咖啡店，中國城市人的談話，充滿各種以前從沒有聽過的用詞和短語。<sup>⑤</sup>漢語能不能像以前那樣，將絕大部份外來詞語「漢化」（尤其是來自英語的）？或是被「洋化」？或是「中西融洽」、「西體中用」、「中體西用」？現在還是未知之數。

### 三、改革開放新詞語的來源及傳播途徑

根據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統計，從1988—98年10年間，內地出版的漢語新詞詞典有30多種。<sup>⑥</sup>國家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于根元研究員等主編的《漢語新詞語》年編說：從1978以來20多年間，出現1萬條比較固定的新詞，平均每年增加500條上下。<sup>⑦</sup>而200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吳景榮、程鎮球主編的最新版本《新時代漢英大詞典》，增加了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詞條，多達4萬條。<sup>⑧</sup>不過，這幾萬條主要譯自英文的新詞語，絕大多數是經貿科技專門術語，在民間的流通量十分有限。

改革開放以來出現這麼多的新詞語，它們來自何方？如何產

生？據汕頭大學文學院朱永鍇、林倫倫的分析，有以下三大渠道：（1）新外來語的吸收；（2）舊詞語的復活；（3）方言詞語的吸收。

由於改革開放的南風從港澳經廣東吹入內地，也就是說，由粵方言區吹入北方方言區或其它方言區，粵方言成了強勢方言，對內地產生了強烈的影響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許多香港粵方言詞語被北方方言所吸收。<sup>⑨</sup>

據不完全的統計，從20世紀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的10年間，有六、七百個新詞直接來源於香港，小部份來自台灣。<sup>⑩</sup>

以上是從外國、中國大陸內部及港澳台三個不同的區域，來說明新詞語的來源。本書在香港出版，主要讀者對象是港澳台及海外的中文讀者，所以，最主要是選擇源於中國大陸的新詞語。其它二方面，則選擇已經內地化，在內地應用較多，或含意轉變了的詞語。

不過，源於中國大陸的新詞語，並不完全是舊有漢語的復活。從舊漢語到新漢語，已經吸收了不少外來語，如佛學詞語來自印度；甲午戰敗後，中國吸收了大量日譯新詞語；而方言詞語，也不限於來自港澳台的方言，還有北方方言（如「大腕兒」「大款」），江浙一帶的吳方言（如「敲定」、「拍板」）；同時，港澳台詞語的西化程度已十分高，特別是引進內地的港澳台詞語，許多本身就是洋化了的外來詞語，如「的士」、「士多」、「卡拉OK」等等。它們多數來自英語；但亦有來自日語。

中國大陸出版的30多種漢語新詞詞典，大都是以內地報刊上出現的詞語為依據，加以篩選、註釋、編排而成。民間流傳的口語及方言，如果是地區性的，或尚未穩定的，或未定型的、或尚未從口語變成文字的，一般不收入，而這一部份新詞語，相信遠遠超過已收入詞典的許多倍。

中國大陸是官方媒體主導議論導向，能在報刊上出現的新詞語，基本上是解釋政府的政策，而不可以自己編造。其原始資

料，大多來源於政府的文件、領導人的著作或講話。官營主流媒體如《人民日報》、《瞭望新聞周刊》、《半月談》等，是製造及傳播改革開放新詞語的最主要來源。基於上述認識，本書主要從政府文件，領導人著述，以及專門解釋政府政策的官方主要報刊，尋找新詞語的來源。

譬如，1980年5月10日創刊的《半月談》，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委托新華社主辦的一本時事政策刊物，其宗旨是「傳達中央精神，反映各界動向，交流思想信息，探討社會問題」。它被譽為「中華第一刊」；它是「時事政策顧問，學習生活益友」，每期銷量超過七百多萬冊，主要讀者對象是縣、鄉黨政幹部，宣傳和新聞工作者，工礦企業和部隊幹部，中小學教師和大專師生。<sup>①</sup>該刊製造的大量簡縮詞語，用短短幾個字簡化複雜的政策條文，經龐大的讀者群廣為流傳，成為改革開放新詞語的主要源頭之一。

又如新華社主辦的《瞭望》新聞周刊，創刊於1981年4月，它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。初為月刊，兩年半後的1984年1月正式出版周刊，成為中國內地第一本新聞周刊。《瞭望》是中國最早報道國家高層決策信息的刊物。以「中南海紀事」專欄起步，《瞭望》更以傳遞來自高層的第一手獨家新聞引起國內外讀者的高度關注，樹立起了它的權威地位。《瞭望》新聞周刊以眾多的欄目，構成了「報道天下大事，縱論世界風雲」的報道格局，內容上形成了追求「高層決策信息、熱點深度報道、專家權威論壇、全新知識背景」的特點，力求對中國及世界重大事件進行權威性深度報道，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現象和發展趨勢作出準確性和前瞻性剖析，內容豐富多采，編排圖文並茂，文風樸實嚴謹，選題集中凝煉，報道全面系統，為讀者提供一個了解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的最具權威性的信息源。<sup>②</sup>它亦成為本書採摘改革開放新詞語的主要來源之一。

改革開放28年來，內地的文字資料——從中央文件，到各地報刊書籍，都可以看到一大批生口生面的詞語，它亦是本書取材

的豐富來源之一。在編寫本書時，本人查閱了1978年以來幾種主要的官方文件及重要的報刊。

本書引用的資料，以黨政機關正式文件為首選，如中共中央的文件、政府公報、法律匯編等；再是主流報刊及各種專書專著；此外，還參考一些港台報刊書籍。

內地大專院校及科研單位，集體編撰的解釋中央政策的專書專著，是創造改革開放新詞語的第二類源頭。如楊天賜主編、中央財經大學等單位的幾十位經濟學專家、教授共同編著的《黨的「十五大」報告經濟詞語解釋》，全書279,000字，收入218條「大多是為群眾普遍關心的經濟詞語，詞語釋文力求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，理論聯繫實際，努力反映各有關經濟學科的新發展、新訊息和在理論上的新突破」。<sup>⑬</sup>再如，王守安主編的《中國經濟新名詞辭典》，有6位副主編，77位撰稿人，收入1979至1993年的經濟新名詞，共3,300多條。<sup>⑭</sup>這些辭典凝集了各方面專家的專業知識，將中央的政策，以簡練的詞語解釋之、規範之、並且廣而宣傳之，因而，成為僅次於官方媒體的次權威新詞源頭。

語家學者們編撰的30多本漢語新詞語詞典，大量地、全面地收編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的新詞語，而且作了通俗的解釋，因此，流傳最廣。如于根元主編《現代漢語新詞語詞典》，收入1949至1992年的新詞、新語、新用法共7,600余條。<sup>⑮</sup>又如林倫倫等編着：《現代漢語新詞語詞典》，收入1978至2000年的新詞語約1,800條。<sup>⑯</sup>語言學者編着的詞典，流通量大，無疑是新詞語的又一源頭之一。不過，這些詞典對詞語的解釋都比較簡短；一般不交代背景資料；甚少引用中央文件等第一手資料；避免觸及敏感的話題，因此，未能滿足海外讀者的需要。

在改革開放大潮之中，民間亦產生數以萬計新詞語。這些詞語有不少已為語言學者們編撰的詞典收入，因而，得以流傳；但是，有更多地區性的、未穩定、未成型、或未從口語變成文字的，或被認為意識不良，甚至「思想反動」的詞語，未能上書報、上電視，因而得不到廣泛地流傳。

#### 四、改革開放的歷程與本書的選材準則

鄧小平的「改革開放」政策，是在1978年中共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戰勝「兩個凡是論」之後，才得以確立的。故在初期，鄧胡趙體系首先是從上而下「解放思想」，擺脫馬列毛思想的一些框框套套，才可能採取對西方開放的改革措施。所以，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新詞語，最主要是對政治思想理論、方針政策，進行「反思」，以便改弦更張。關於這一部份的主要內容，1992年出版的拙作《中國大陸政治術語》，已有相當的篇幅，加以闡述。

經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「清除精神污染」，80年代中期的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」，以及1989年「六四事件」的衝擊，「改革開放」有面臨可能前功盡廢的危機。

1992年初，鄧小平「南巡」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，發表「三個一點」、「三個有利於」、「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」等重要講話，推動第二階段的「改革開放」。鄧小平的「韜光養晦」外交策略，為中國大陸贏得和平發展的時間及國際大環境。第二輪「改革開放」，從農村推向城市；由第一、二產業，進入第三、四產業。黨政官員時尚按「國際慣例」辦事，目標是逐步與國際社會「接軌」。

1993年3月，鄧小平重用副總理朱鎔基主管經濟，推行「宏觀調控」。同年5月朱兼任農業領導小組組長，處理「三農問題」；6月，朱兼任央行行長，改革金融體制。

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病逝。7月1日，香港回歸，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。9月，中共召開「十五大」，江澤民作政治報告，重申「依法治國」的政治主張，並將建設「法制國家」改為建設「法治國家」。10月，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成立。該中心每半年發布一次的全國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顯示，內地「網民」每半年「翻一番」，至2003年底的統計，互聯網用戶已達到7,800萬戶。

1998年3月，北京召開九屆人大一次會議，朱鎔基當選為總理。他提出的施政總目標是：「一個確保，三個到位，五項改